“他的文化视野甚为宽阔”

——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

□ 本报特约记者　柯　岩

最近在美国出版的《习近平时代》一书称，“从习近平自己述及的长长的‘书单’来看，他的文化视野甚为宽阔，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音乐、古希腊、文艺复兴、现当代，都涵盖其中；他的描述评价并非礼节性的赞美，不限于外交场合，而是有感而发，带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

“总会以典雅蕴藉又高度概括的经典名句来传达思想”

《习近平时代》对习近平的文化情怀作了详细研究和评述，说“习近平30年前初入政坛时的至交、作家贾大山曾给过他这样的一个评价：儒生”。“习近平的儒生气质，最直接的表现是善于立言：为追思焦裕禄而填词、为表达拥军情义而作七律，勤奋地写下大量反映个人独立思考的专栏著述，甚至还有‘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意的语言写入中央城镇化会议公报。”“从他的个人经历、执政风格到文章思想，修齐治平、三不朽、‘横渠四句’等儒家经典的使命追求，处处可见。”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叶·彼·巴扎诺夫接受《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作者塔夫罗夫斯基采访时说，习近平主席很了解俄罗斯文化，而且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他阅读了很多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经典，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理、肖洛霍夫和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名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在习近平的意识里占有特殊地位。

《习近平时代》具体介绍了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访欧之旅，说这次出访“虽是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四国的国事访问，但几乎可以视作习近平充分展示其文化思想、文化视野的文化之旅。11天，4篇文章，4次公开演讲，这位政治家以充满文艺色彩的表达向世界解释‘中国梦’，而人们恰恰能从他的言谈中细读其文化渊源”。“有媒体统计说，此次出访全程中，习近平曾提及法国名人34位、艺术形象3人，还有凡尔赛宫、卢浮宫等建筑；提及德国名人19位，艺术形象有歌德名作《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

2015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欢迎晚宴上的演讲中，借用流行美剧《纸牌屋》做比喻，强调中国反腐行动不是“政治斗争”。讲到对不同文化和文明需要深入了解时，他提到了自己喜爱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对此，美国彭博社的评论指出，在面对美国商业精英的演讲中，习近平展现了对美国文化的了解，提到很多“对美国人口味”的地方。法新社则报道称，习近平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名言，回顾了他之前对西雅图的访问，他还熟知美国流行文化，提到了喜剧电影《西雅图不眠夜》。他的讲话迷倒了在场听众。

德国N-TV电视台网站则刊文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的演讲使用了大量引言、警句和典故。除了一些中国的哲学家和成语外，他还提到了歌德、莱布尼茨、莱辛，以及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习近平借此想表达的意思很清楚：我努力去理解你们，也请你们这样做！习近平一再强调，不论中国的发展看来是什么样子，都一定是和平的。他用历史来证明，中国5000年的文化一直是和平的文化。

《习近平时代》称：“几乎人人都知道，习近平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特别是外交场合，他讲述的故事新鲜有趣、温馨而内涵甚远，并且不显刻意，比如‘鼓岭故事’‘义乌阿拉伯餐馆’‘中国小夫妻的非洲之旅’‘中国母子为二战苏联空军志愿军烈士守护陵园50余年’，等等。对于对外文化传播，习近平的要求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人们发现，习近平并不仅在一些场合引用一两句古诗文作为点缀，而是在过去20余年的行文、讲话中，时时处处引用中国古代典籍或诗作，密度极高，从容熟稔。引述的来源非常广泛，并不限于《论语》《孟子》《左传》《老子》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还有一些甚至有点生僻的古籍、诗文。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的这种表达风格更加鲜明，无论国内视察、与公众交流，还是出访时演讲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他总会以典雅蕴藉又高度概括的经典名句来传达思想。”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是对传统世界观的升华”

针对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习近平时代》称，“习近平面对的难题是，不能使中国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讨者，因此必须唤醒中华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必须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他在文化上的课题是“如何恢复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使中国人成为世界高尚品格的代表，使中国精神能够像灯塔一样驱散黑暗，照亮人类进步的航程”。

2014年12月，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传写书评说：“习近平主席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显示出中国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会反受其累，因为这很可能引发并非本意的危机甚至战争，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华文明更能提振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觉。”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在其《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中说，习近平很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孔子这位先贤梦想有朝一日能消除各诸侯国间的敌对，实现普天之下的繁荣与和谐。习近平似乎很乐于通过读孔子著作的方式与这位先师交流。这一点可以从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旁征博引《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语句得到说明。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在北京大学演讲稿中，我就发现他创纪录地引用了20次。习近平在去孔子的家乡曲阜参观时，特别强调了自己对孔圣人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他发表了演讲，内容是关于继承儒学中的和平与发展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当代中国共产党实践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体系，习近平将儒学价值观一一列出。要知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着儒家思想的精神。

2014年9月28日，首届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大典在福州文庙隆重举行，习近平致信祝贺，对此，美国《世界日报》刊文称，习近平一再为传统文化撑腰，不仅是其个人喜好，更是在树立“三个自信”的历史文化基础。

《习近平时代》称，“传统文化、更进一步说儒家文化，对于习近平而言并不是散发着陈腐气息、意识形态色彩暧昧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过现代化创造，焕发强大能量、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在习近平看来，无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或是制度自信，最根本是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造、价值观念梳理清晰，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他并未止步于在文化态度上的致敬，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在‘中国梦’以及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都将传统文化当作‘根’与‘魂’”。习近平善于用典，“其实，用典只是‘表’，而‘里’是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框架构设中，将传统文化精华作为主材料”。“他上任后着力营造的‘中国梦’这一概念，正是以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为基础的。”“所谓‘中国梦’首先植根于‘中国特色’。由习近平在各个场合不厌其烦的阐述可知，外界与其关注‘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如将之视作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当代中国结合的产物。”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列·谢·彼列洛莫夫在接受《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作者塔夫罗夫斯基采访时说，前不久我去了孔子的故乡——曲阜，在那里参加了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大会，有幸坐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身旁。他认真听取了来自不同国家学者的发言，并发表了讲话。他还带了《论语诠解》和《孔子家语通解》两部书回北京。这种对几千年前先师的由衷崇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动。我从“中国梦”这一概念中、从习近平经常引用的先师名言中强烈地意识到，他致力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把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在此，正是孔夫子学说中的爱国主义有助于加强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建立用汉字书写规范和儒学统一起来的大中华。彼列洛莫夫说，“先国后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将国家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只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才能为每个人、每个家庭和整个国民提供幸福生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是对传统世界观的升华”。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

多维网2014年8月刊文《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说，更应该被注意的是，习近平正悄然主导一场革新中共执政理论与法理基础的革命。他将如何去做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非常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与深厚。

2014年3月底，习近平主席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在柏林的科尔伯基金会发表了演讲。阿拉伯国家联盟前驻中国办事处主任阿卜杜勒·瓦哈卜·萨基特认为，习近平演讲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和谐共存的理念，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中国实现了稳定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世界在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这样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中国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年3月底的欧洲之旅中，习近平还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演讲。泰国《亚洲日报》副社长钱丰认为，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出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对世界文明从物质到精神层面进行了界定。文明的不同也包括意识形态的不同，正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造就了世界文明丰富多彩。每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可贵而平等的。正如习主席在讲话中所说，只有互相包容、互相学习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中美交流基金会网站5月28日发表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比尔·布莱克的分析文章称，演讲的内容是习主席演说的精彩之处。“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消除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的隔阂，帮助欧洲人理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通过解释中国的漫长历史与目前的挑战，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尼尔·卡洛韦说，她十分认同习主席讲话中对民间外交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阐述，民间交流对推动国家间交往意义重大，而推动民间外交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不同国家的人民了解彼此的历史与文化。

2014年9月2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习近平主席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说，习近平的讲话在推崇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向外界表明他的“文化观”，透露了其对继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他的“文化观”强调维护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正确学习借鉴，及发展与传承的相互结合。

《习近平时代》称，“在习近平力倡抓文化传统之后，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了更高的期许——在人类文明行至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时，新的文明复兴将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以‘和’为核心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可有所作为”。“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坐标系中，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习近平还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

党建科学化

怎样提高依规治党水平

提高依规治党的水平，是与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维护党内法规权威，提高党的活动绩效相联系的。依规治党首先是党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组织运行的规范性。它包含着党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运行，也包含着党依据法律和党内法规体系处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党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

□ 蔡志强

如何实现党内法规建设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保障党内法规的权威运行，体现了党的政治生态和党的现代化的水平。

党建科学化的一个重大命题

提高依规治党的水平，是与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维护党内法规权威，提高党的活动绩效相联系的。依规治党首先是党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组织运行的规范性。它包含着党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运行，也包含着党依据法律和党内法规体系处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党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

坚持依规治党，一是在法治逻辑里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形成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和规范；克服以权谋私或者权力行使过程的边界不清、权责不明问题。二是以制度形式落实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保障政令畅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目标变成地方发展的具体实践。三是规范党的职能部门、各级党组织的机构设置和功能界定，整合执政资源，保障权力运行的科学性。四是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形成党的制度改革的系统思维，并以法的形式建构党内法规的权威，在全党牢固树立制度面前没有特权、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的观念，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能保障组织活力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党的领导干部作为落实“四个全面”的“关键少数”，担负着以其创造性工作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党的根本任务的重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就是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权威性、规范性，防止用权任性。实践中，党内法规体系权威不足、运行不力容易引发各种治理问题。例如，囿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一些领导干部倾向于通过权力寻租来满足个体私利，尤其是在责权不对等且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一些干部通过交易行为和倾斜性政策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甚至获得巨额利益；一些干部则通过权力配置资源中的比较优势打压他人；还有少数干部面对严格执行的党内法规，消极抵触，放纵一些不良现象蔓延，任由社会不满情绪积累，企图以此消解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并使得法不责众思想弥漫，加剧情绪对立和行为失范。这些行为，极大耗损了党的政治资源，侵蚀了党的合法性基础。依规治党，就是要通过纪律的严格执行实现对这类行为的遏制和惩治。

依规治党的基础

党的严密组织和严明纪律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础。党的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保障党员干部队伍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精神，来形成依规治党管党的动力机制，形成干部躬行践履党的宗旨的激励机制。

结构完善、规范到位、运行顺畅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依规治党的基础。自邓小平提出要从制度上建党，走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制度来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以党章为核心，包含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等在内的党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准则。

健全党内法规体系，首先是指党内法规能够覆盖党的执政和自身建设的全过程全领域。其次是指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在法理、学理和执行上的一致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理论贡献和实践成果之一，就是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依法治国战略。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运行。再次是指党内法规建设的“立法”主体、执纪主体、监督主体是明晰的。最后是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内法规体系具有系统性、规范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点。

中国共产党在95年的建设中形成的一系列法规确保了党的建设和领导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推进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现代化发展。但是不同目标任务不同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党内法规，需要结合变化形势适时修改完善，尤其是经济政治发展新的阶段，更加需要健全成熟的党内法规体系来保证党的运行绩效。基于此，党对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6月期间出台的2.3万多件中央文件进行集中清理，1178件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322件被废止、369件被宣布失效；继续有效的有487件，其中42件适时进行修改。在此基础上，中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发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并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密集修订和颁发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内的一系列党内法规。这些法规规范和完善了党的组织纪律，廓清了党纪和国法的边界，形成了党内激励和惩戒的有效机制，保障了党纪挺在法律前面，党纪高于国法的制度逻辑，为落实依规治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维护党章权威落实党内法规

考量依规治党的水平，要看党内法规是否得到人们普遍的遵守践行，以及党内法规对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维护程度。党内法规有效运行，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愿意在服务群众中约束权力；其次是执行者愿意认真去执行；再次是党内法规运行能够获得现实的物质支撑和文化依托。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党内法规的尊崇，建构了制度得以运行的基础环境。制度成长的实践表明，党内法规不是越精细越好，也不是制定得越多越好。党内法规的生成是与社会发展的秩序要求、党的执政实践以及人们的价值期待和具体利益相联系的。同时，党内法规运行还与有效的民主监督相联系，与权力运行的绩效和公平性相联系。依规治党需要通过党的的组织文化和社会文化建构，使权力主体和党员群众对制度权威始终持有尊崇意愿，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怀有敬畏心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以保证领导干部的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建构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内法规体系，就是要以铁的纪律保障党的主张经由党的组织和成员的严格执行变为具体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通过严格执纪和教育培训确立党员领导干部党章意识和党章权威，形成严明的党内纪律和纪律运行机制，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和改革措施的落实。党通过维护党章权威落实党章要求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并保证党性修养变成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方式；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形成依法执政的组织环境，实现对权力的规范和反腐败工作的推进。

坚持依规治党要注意减少制度资源耗损，提高制度运行效能。党内法规是在坚持党内民主基础上经由法定程序制定而成的，具有科学性、强制性和平等性。也就是以法的形式来肯定权力运行的权威性，以法的形式来确定权力运行的责任要求。如果党内法规制定后被束之高阁或难以执行，则表明党内法规制定不科学或者党的纪律涣散。党的各项制度出台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其结果是制度权威削弱，制度低效运行并耗损党的社会基础，导致党内大量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和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例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干部能上能下的要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领导干部能上不好下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此后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规定连续出台和落实，既体现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在理念落实、程序规范等方面新的突破，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更趋完善，也体现了依规治党的权威性，成为党凝聚党建资源，激发党员领导干部创造性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建构良好政治生态，关键在于从严管理干部，细化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的具体要求，实现责权对等，避免权力溢出效应和为官不为问题。坚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强化底线管理，克服党的纪律约束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同时，在落实八项规定中将党员内在自律与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联系在一起，不断创造和提供民主成长尤其是协商民主发育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机制。近年的实践表明，党的八项规定作为一种强制性约束机制，除了以上率下的带头示范效应和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外，它还是党领导人民发挥社会监督功能的制度化实践。八项规定因为有完善的评价体系、处罚措施、沟通与反馈机制，其所形成的纪律标准和监督要求使得群众获得了更好监督党和政府的制度平台和激励机制，监督意识和能力迅速增强，干部有违八项规定要求的行为明显收敛。由此，依规治党通过完善的制度化参与实现了党对人民监督的引导和保障。